

# 年报问询函、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沈萍, 景瑞

(兰州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作为证监会监管转型的重要手段,非处罚性监管受到政策制定者以及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以问询函机制为载体的监管方式使得上市公司年报“卸妆”,公司存在的疑点问题暴露于公众,令投资者拍手叫好。而审计师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是否会将问询函视为一种风险预警信号,从而改变其审计定价决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此,利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交易所发放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定价呈正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审计成本的度量指标——审计延迟,进一步揭示审计定价提高是审计师要求风险溢价补偿的结果,审计师并没有对收到问询函上市公司增加更多的审计投入。这种相关性在非国有性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差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不仅丰富了问询函与审计师定价行为的文献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问询函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

**[关键词]** 年报问询函; 审计定价; 审计延迟; 审计风险; 审计成本; 审计需求; 信息披露; 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20)02-0001-10

## 一、引言

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理念的深入人心,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将“深化监管体制改革”融入发展战略。追根溯源,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直通车可谓是监管创新转型的“雏形”,但是当时并未受到学者们的足够关注。沪深证券交易所为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分别于2013年7月1日和2014年1月13日开通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并不断修订完善其相关业务指引,在信息披露直通车开通前,上市公司公告必须经交易所审核方能发布。但在信息披露直通车互联网电子化模式下,上市公司直接将公告提交给指定披露媒体,交易所再进行事后监管。监管重心后移的转型举措也是证监会强化交易所履行一线监管职责、培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主体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作为沪深交易所事后监管手段之一的问询函是指当沪深交易所审核公司特定事项或者年报时,发现其中信息披露不准确、内容不全或者存在“疑点”,随后向上市公司发放的问询函件,要求上市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回复问询事项并予以公开,对于一些还存在“疑点”的事项,证券交易所会再次发函问询<sup>[1-2]</sup>。随着2013年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的实施,问询函作为交易所事后监管的一道监管关卡,逐渐渗透到上市公司经营运作的每个环节,对上市公司异常事件来龙去脉进行“剥丝抽茧”般层层问询,引导上市公司规范信息披露,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在减少中小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维护投资者利益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所有问询函类型中,年报问询函数量居多,且审核重点在于年报中业绩真实性、资金占用、公司治理、并购整合、业绩承诺履行、信息披露以及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等相关情况。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说明公司披露的年报中或多或少存在“漏洞”,需要上市公司进一步说明。年报问询函释放的风险信号是否会对担负着财务报表信息质量鉴定职责的审计师的审计服务定价造成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审计师将年

**[收稿日期]** 2019-10-05

**[基金项目]**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JR3RA215);兰州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201801;201802)

**[作者简介]** 沈萍(1965—),女,湖北黄陂人,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景瑞(1993—),女,甘肃武威人,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理财,邮箱:756032477@qq.com。

报问询函视为上市公司风险增加的一种信号<sup>[3]</sup>,对收到年报问询函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会实施更为全面、充分的审计程序或者因为承担高风险而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无论审计师采取哪一种措施都会导致审计收费增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问询函机制下,上市公司年报可以使审计师更全面地了解到公司各个方面,从而更好地利用职业怀疑与职业谨慎对公司的潜在风险做出更精准的定位,审计费用也随之减少。因此问询函与审计收费的关系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有待进一步考证。年报问询函如果会对审计定价造成影响,又是通过什么作用机理实现的? 这些问题仍需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文利用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年报问询函监管是否会使审计师调整审计定价。研究表明,对于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审计师在为其提供审计服务时会收取风险溢价而不是通过增加审计投入来转移自身风险,因此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要高于未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且问询函与审计收费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产权性质、内部控制治理水平差以及处于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较为显著。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问询函的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为非行政监管对审计师行为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本文在已有学者研究问询函与审计收费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剖析问询函对审计收费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揭示审计收费的提高是审计师收取风险溢价的结果,而非审计投入的增加所致。第三,本文进一步分析问询函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以及外部法制环境下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针对问询函对审计师行为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与变量定义;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的报告;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为本文的结论与研究展望部分。

## 二、文献回顾

以往关于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基于审计契约主客体特征,比如被审计公司规模、经济业务复杂性、审计师个体特征、事务所规模以及非审计服务等,且多数文献研究表明,对于被审计公司而言,自身公司规模或者选择的事务所规模越大、经济业务复杂程度越高,其被收取的审计费用往往也越高,如果事务所为被审计公司提供非审计服务时也会导致审计收费的提高<sup>[4-6]</sup>。随着审计市场的逐渐发展,审计师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监管制度环境也会对审计师定价行为产生影响,且国内外现有关于两者关系的文献大多是基于处罚性监管的研究<sup>[7-9]</sup>,只有少数几篇研究非处罚性监管和审计师定价行为两者关系的相关文献。

Gietzmann 等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的季报、快报等意见信为研究对象,发现对于收到意见信的公司,审计师会重新评估其信誉以及潜在的风险,因此对于此类公司收取的审计费用会明显高于未收到意见信的公司,尤其是包含“会计”“风险”字眼的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上调作用更为显著<sup>[3]</sup>。不同于 Gietzmann 等的研究,我国学者陈硕等主要关注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年报问询函与审计收费的关系,研究证实了在以风险为导向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师会将问询函视为一种风险信号,其可能会选择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作为风险溢价补偿,或者为了规避审计失败风险带来的声誉损失与诉讼风险,审计师可能会增加审计程序,扩大审计范围,使得审计成本增加,这两种方式都会使得审计师向被审计公司收取的审计费用有所提高,且如果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涵盖的问题或者问询次数越多,支付的审计费用也会越高<sup>[10]</sup>。米莉等利用2015—2017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问询函与审计收费的正相关关系<sup>[11]</sup>。陈运森等以2013—2016年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非处罚性监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sup>[12]</sup>。实证结果表明,对于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外部信息使用者关注度普遍较高,因此审计师在自身声誉损坏风险、审计失败所面临的诉讼风险以及行政处罚压力下,会扩大审计范围,投入更多精力与时间,从而提高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审计质量得以提升<sup>[12]</sup>。不同于陈运森等

的研究,陶雄华和曹松威以审计意见的激进度作为审计质量的反向度量指标,借助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证实了年报问询函一方面会通过提问的方式“迫使”公司对于存在的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缓解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作为年报“三位一体”监管联动机制<sup>①</sup>之一的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年报问询函会对审计师行为产生威慑力,进而提高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sup>[13]</sup>。此外,陶雄华和陈运森等的文章都通过对问询函特征进一步分类发现,上市公司如果收到明确强调需要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发表审查意见的问询函时,该问询函对审计质量的改进作用更为显著<sup>[12-13]</sup>。

在现有研究问询函对审计师行为产生影响的文献中,多数学者认为在风险导向为基础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师对于审计监管风险的关注可能会强于法律诉讼风险,因此监管风险成为了审计师定价考虑的最主要因素<sup>[14-15]</sup>。在现有研究问询函对审计师行为产生影响的文献中,关于问询函与审计收费的相关研究尚存在疑点。Gietzmann、陈硕等学者们只是从理论上指出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研究设计方面也仅仅研究问询函与审计费用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但并未对其真正内在影响机理进行深入研究<sup>[3,10]</sup>。因为审计定价的决定因素包括审计成本与风险溢价<sup>[16-17]</sup>,所以审计费用与问询函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以下几种情况造成的:一是审计师将问询函视为风险的一种预警信号,因此增加努力程度,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导致审计成本上升,审计费用相应增加;二是审计师面对问询函释放的风险信号,仅仅采取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来弥补将来审计失败的损失,而不愿付出更多的努力;三是审计师认为收到问询函企业势必存在风险,一方面会增加努力程度,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会提高风险溢价,使得审计定价提高。因此本文希望借助2015—2018年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数据对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两者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年报不仅是上市公司向外界展示自身价值的工具之一,更是外部投资者了解上市公司的重要通道之一,其信息披露的质量显得至关重要。为了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责任,证券交易所采取直通车方式披露信息,旨在将更多的信息披露主动权交给上市公司,交易所对于公司披露的相关信息进行事后审核,从而实现沪深证券交易所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中发挥第一线监管职能。在此监管转型背景下,证券交易所推出事后监管的问询函制度。上市公司先自行根据公司一年的经营业绩披露相关信息,而证券交易所针对其中披露不准确、内容不完整或者存在“疑点”的信息向上市公司下发年报问询函,并要求公司在规定时间进行解释以及披露相关回函,因此年报问询函会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缓解监管者与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问题。“刨根问底”的问询函会像“揭盖子”般让上市公司更多的信息暴露在公众面前,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含金量”,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进行决策。上市公司的年报经过交易所层层问询,将导致利益输送、关联交易、业绩“地雷”、报表粉饰等可能引发上市公司重大风险的异常事件都会被“剥丝抽茧”般询问。此外,交易所还要求上市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回复相关问题并及时披露相关回复函件,在上市公司与交易所一来一回中,可以缓解审计师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审计师掌握上市公司更多的信息,同时也使得上市公司的一些异常风险事件在此过程中无处遁形<sup>[18]</sup>。同时审计师可以掌握上市公司更多的信息,及时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定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已有文献表明问询函不仅会通过发现财务报表“瑕疵”引起资本市场负面反应,降低投资者对于公司的信任程度,而且能加强交易所识别盈余管理能力<sup>[19-20]</sup>,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吹哨者”的风险甄别能力<sup>[21]</sup>。因此在以风险导向为基础的审计模式下,审计师不得不对年报问询函释放的风险信号格外敏感。对于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为了避免后续审计失败带来的声誉损失以及诉讼风险,审计师在提供审计服

① “三位一体”的年报监管联动机制是指我国形成的证监会上市部、各地证监局、交易所三者互联互通监管信息的年报监管形式。

务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扩大实质性审计范围,审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审计收费增加。年报问询函更易让审计师感受到被审计公司潜在的风险,为了避免审计风险,审计师会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更加谨慎地进行审计工作,通过实施更充分的审计程序,因此审计收费也会相应增加。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sub>1</su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高于未收到的上市公司。

从审计师的角度来看,审计定价的决定因素包括审计成本与风险溢价。审计师面对问询函释放的风险信号时,可以采取三种策略:一是对于收到问询函的公司,审计师提高努力程度,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导致审计成本上升,相应审计收费增加。二是根据审计需求保险理论,审计师可以要求被审计公司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作为风险溢价以弥补将来审计失败可能带来的损失<sup>[22]</sup>。三是审计师认为收到问询函的企业势必存在风险,一方面会增加努力程度,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对于公司潜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层的剖析,另一方面会提高风险溢价,最终导致审计定价提高。对于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来说,审计师进行审计定价时会考虑采用提高努力程度从而使得审计成本增加的第一种策略,还是不增加审计投入仅收取风险溢价的第二种策略或者是两种策略并用,均取决于年报问询函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因此本文在研究问询函对审计收费产生的影响过程中,引入了审计延迟变量。审计延迟是指审计师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时间,与审计定价相比,其在反映审计师努力程度以及审计范围方面更为直观<sup>[16]</sup>。如果审计师在对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产生审计延迟,表明审计师努力程度增加,扩大审计范围,审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如果审计师只是仅仅对收到问询函公司收取风险溢价导致审计收费增加,而并没有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进行审计工作,那么,问询函就不会造成审计延迟,在此种情况下,问询函与审计延迟没有显著关系。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2:

H<sub>2a</su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延迟呈正相关关系。

H<sub>2b</sub>: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报问询函不会对审计延迟造成影响。

#### 四、研究设计和变量定义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sup>①</sup>,财务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信息公开”专栏手工整理2015—2018年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数据,并通过巨潮资讯网作进一步补充。2015—2018年问询函针对上市公司2014—2017年年报,问询函的时间滞后一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内生性。此外,在样本选择中,按照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做了剔除:(1)金融类、保险类行业上市公司;(2)ST上市公司;(3)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共得到9653个样本,年报问询时间样本为1360个,其中,2015年187个,2016年284个,2017年348个,2018年540个。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分别在1%和99%位置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 (二)变量定义

######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作为审计定价( $Lnfee$ )的衡量指标,用资产负债表日到审计报告日之间的日历天数加1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审计延迟( $Lnarl$ )指标。

###### 2.解释变量

年报问询函是指沪深交易所针对上一年年报中存在的问题向上市公司发放问询函,要求上市公司在

①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2013年7月1日和2014年1月13日开通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并于2014年12月在“监管信息公开”公告栏公布问询函以及上市公司的相应回复函件。鉴于2014年交易所只发放了少量的年报问询函,因此本文选取2015作为年报问询函样本起始时间。

规定时间内回复并公开披露,对于回复不清或者还存在“疑点”的事项,交易所还会进行重复问询。所以本文选取上市公司收到的第一封年报问询函为研究重点,以此设置年报问询函虚拟变量( $Cl$ ,收到为1,否则为0)。

### 3.控制变量

参照陈运森和陶雄华等的研究<sup>[12-13]</sup>,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 $Size$ )、资产负债率( $Lev$ )、资产收益率( $Roe$ )、公司年龄( $Age$ )、成长性( $Growth$ )、托宾Q值( $Tobin's Q$ )、产权性质( $State$ )、审计师类型( $Big4$ )、股权制衡度( $Share$ )、董事会规模( $Board$ )、独立董事比例( $Indire$ )、高管持股比例( $Mshr$ )、盈亏水平( $Loss$ )变量,同时设置了年份和行业两个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1与假设2,本文采用如下OLS模型,用模型(1)检验年报问询函( $Cl$ )对审计定价( $Lnfee$ )的影响,用模型(2)检验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延迟( $Lnarl$ )的影响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审计定价	$Lnfee$	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
	审计延迟	$Lnarl$	资产负债表日到审计报告日之间的日历天数加1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年报问询函	$Cl$	虚拟变量,若上市公司当年收到年报问询函则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总资产
	公司年龄	$Age$	公司上市年限加1取自然对数
	成长性	$Growth$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
	托宾Q值	$Tobin's Q$	市场价值/账面价值
	产权性质	$State$	国有企业取值为1,非国有企业为0
	审计师类型	$Big4$	公司由“四大”事务所审计为1,否则为0
	股权制衡度	$Share$	第二大股东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ndire$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高管持股比例	$Mshr$	高管持股数/总股数
	盈亏水平	$Loss$	当期净利润为负取值为1,否则为0
行业控制变量	$Industry$	按照2012年证监会CSRC行业分类标准划分	
年度控制变量	$Year$	共四年,设置3个年份虚拟变量	

$$Lnfee = \alpha_0 + \alpha_1 Cl + \alpha_2 Size + \alpha_3 Lev + \alpha_4 Roe + \alpha_5 Age + \alpha_6 Growth + \alpha_7 Tobin's Q + \alpha_8 State + \alpha_9 Big4 + \alpha_{10} Share + \alpha_{11} Board + \alpha_{12} Indire + \alpha_{13} Mshr + \alpha_{14} Los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1)$$

$$Lnarl = \alpha_0 + \alpha_1 Cl + \alpha_2 Size + \alpha_3 Lev + \alpha_4 Roe + \alpha_5 Age + \alpha_6 Growth + \alpha_7 Tobin's Q + \alpha_8 State + \alpha_9 Big4 + \alpha_{10} Share + \alpha_{11} Board + \alpha_{12} Indire + \alpha_{13} Mshr + \alpha_{14} Loss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2)$$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表2的Panel A列示了年报问询函样本分布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在2015—2018年间,共有1359家公司收到年度年报问询函,且年报问询函数量逐年增加,表明沪深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力度逐渐加强。表2的Panel B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年报问询函( $Cl$ )均值为0.14,说明样本期间大约有14%的上市公司被沪深交易所进行年报问询,这表明上市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已是常态,问询函监管在上市公司监管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审计费用 $Lnfee$ 平均值为13.87,中位数为13.76,审计延迟 $Lnarl$ 平均值为4.54,中位数为4.60。控制变量方面, $Big4$ 的均值为0.07,表明样本中仅有7%的上市公司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其余变量的分布均在合理范围。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年报问询函 $Cl$ 与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Lnfee$ 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审计师对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初步证明假设 $H_1$ 成立。 $Cl$ 与审计延迟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 $H_{2a}$ 一致。在回归分析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时发现所有VIF均小于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4列式了模型(1)与模型(2)的回归结果。第(1)列是年报问询函*Cl*与审计定价两种衡量指标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Cl*与*Lnfee*相关系数为0.02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审计师会将年报问询函视为风险预警,为了避免后续审计失败带来的声誉损失以及诉讼风险,审计师会对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假设H<sub>1</sub>得到验证。而在第(2)列对年报问询函*Cl*与审计延迟变量*Lnarl*进行回归时,发现两者没有显著关系。这意味着面对年报问询函释放的风险信号,审计师并没有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进行审计工作,增加审计投入,这与假设H<sub>2b</sub>一致。模型(1)、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师对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的确意识到潜在的审计风险,因此会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但是审计定价的增加是由于审计师收取一定的风险溢价造成,而不是审计师增加审计投入的结果。

控制变量方面,在以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Size*、*Lev*以及*Big4*与审计收费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审计师对规模较大、风险较高以及采用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此结果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三)进一步分析

1.产权性质分析

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因其自身产权的特殊性能获得更多的政府政策优惠以及财务支持,与政府关系密切,而非国有企业只能望尘却步。因此有学者指出审计师在评估服务公司风险以及对审计服务定价时会将产权性质纳入考虑范围<sup>[23]</sup>。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会降

表2 描述性统计表

Panel A: 年报问询函分年度观测值						
会计年度	被问询观测数	年报问询函占比				
2015	187	13.76%				
2016	284	20.90%				
2017	348	25.61%				
2018	540	39.73%				
合计	1359	100%				
Panel B: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Cl</i>	9653	0.14	0.35	0.00	0.00	1.00
<i>Lnfee</i>	9653	13.87	0.72	12.61	13.76	16.64
<i>Lnarl</i>	9653	4.54	0.23	3.58	4.60	4.78
<i>Size</i>	9653	22.40	1.39	19.78	22.18	27.32
<i>Lev</i>	9653	0.44	0.21	0.06	0.43	0.93
<i>Roe</i>	9653	0.07	0.10	-0.41	0.07	0.37
<i>Age</i>	9653	11.36	6.71	2.00	10.00	24.00
<i>Growth</i>	9653	0.18	0.42	-0.57	0.10	2.50
<i>Tobin's Q</i>	9653	2.45	2.22	0.16	1.82	13.10
<i>Stata</i>	9653	0.39	0.49	0.00	0.00	1.00
<i>Big4</i>	9653	0.07	0.25	0.00	0.00	1.00
<i>Share</i>	9653	0.23	0.13	0.02	0.22	0.55
<i>Board</i>	9653	2.13	0.21	1.61	2.20	2.71
<i>Indire</i>	9653	0.38	0.05	0.33	0.36	0.57
<i>Mshr</i>	9653	0.06	0.12	0.00	0.00	0.56
<i>Loss</i>	9653	0.09	0.29	0.00	0.00	1.00

表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i>Cl</i>	<i>Lnfee</i>	<i>Lnarl</i>	<i>Size</i>	<i>Lev</i>	<i>Roe</i>	<i>Age</i>	<i>Growth</i>	<i>Tobin's Q</i>	<i>Stata</i>	<i>Big4</i>	<i>Share</i>	<i>Board</i>	<i>Indire</i>	<i>Mshr</i>	<i>Loss</i>
<i>Cl</i>	1.000															
<i>Lnfee</i>	0.064***	1.000														
<i>Lnarl</i>	0.040***	0.066***	1.000													
<i>Size</i>	-0.110***	0.782***	0.051***	1.000												
<i>Lev</i>	0.014	0.422***	0.035***	0.545***	1.000											
<i>Roe</i>	-0.114***	0.110***	-0.099***	0.169***	-0.086***	1.000										
<i>Age</i>	-0.123***	0.234***	-0.029***	0.249***	0.316***	-0.045***	1.000									
<i>Growth</i>	0.028***	-0.001	-0.026**	0.019*	-0.004	0.212***	-0.097***	1.000								
<i>Tobin's Q</i>	0.069**	-0.392***	-0.084**	-0.590***	-0.453***	0.062***	-0.180***	0.036***	1.000							
<i>Stata</i>	-0.144***	0.203***	-0.044***	0.297***	0.260***	-0.082***	0.404***	-0.137***	-0.261***	1.000						
<i>Big4</i>	-0.072***	0.513***	-0.049***	0.450***	0.197***	0.092***	0.062***	-0.026***	-0.166***	0.116***	1.000					
<i>Share</i>	0.070***	0.014	0.004	0.051***	-0.103***	0.110***	-0.258***	0.170***	0.088***	-0.251***	0.081***	1.000				
<i>Board</i>	-0.092***	0.002	0.007	0.328***	0.204***	0.059***	0.130***	-0.040***	-0.229***	0.216***	0.166***	0.035***	1.000			
<i>Indire</i>	0.033***	0.006	-0.001	-0.015	-0.022***	-0.031***	-0.046***	0.007	0.087***	-0.049***	0.021**	-0.008	-0.536***	1.000		
<i>Mshr</i>	0.062*	0.015	-0.005	-0.240***	-0.240***	0.052***	-0.423***	0.105***	0.210***	-0.328***	-0.107***	0.180***	-0.162***	0.088***	1.000	
<i>Loss</i>	0.114***	0.069***	0.079***	-0.095***	0.152***	-0.642***	0.074***	-0.170***	0.038***	0.052***	-0.048***	-0.086***	-0.037***	0.034***	-0.053***	1.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相关。

低国有企业经营固有风险<sup>[2]</sup>,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更弱,相应发生审计风险的概率有所下降,审计费用也会更低。基于此,本文根据产权性质将样本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此探究产权性质对问询函与审计定价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5所示,非国有企业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国有企业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无显著关系。这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未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企业,国有企业中不存在这种差异,因此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在对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延迟的回归分析发现,对于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不管其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审计师都不会增加审计投入,甚至可能减少一定的工作量,或是直接收取风险溢价来应对风险。

### 2. 内部控制的影响

自从萨班斯法案颁布以来,内部控制在公司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内部控制决定着企业对外披露信息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有效的内部控制一方面可以减少包括审计师在内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另一方面能够控制公司经营中存在的各种风险<sup>[24]</sup>。因此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势必会降低企业固有风险,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减少审计师工作量,缩小审计范围,进而降低审计收费。相反,内部控制差的公司存在较大的自身风险,导致审计风险加大,而且其信息披露质量差,处于信息劣势,审计师迫于潜在审计失败后的声誉与诉讼损失的压力,会加大审计努力程度或者收取更高的审计溢价。因此,本文对“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加1并取自然对数后,利用其中位数将样本公司分为两组,将高于内部控制指数中位数的样本定义为内部控制质量高组,其他为内部控制质量低组。如表6所示,在内部控制质量低组,年报问询函与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在5%水平上正相关,而在内部控制高组,两者之前无显著关系,在审计延迟模型中,无论样本处于内部控制高组还是内部控制低组,问询函与审计延迟都不存在相关关系。回归结果一方面说明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公司较为显著,表明年报问询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部控制监督不足;另一方面说明无论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如何,审计师都会选择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来面对年报问询函释放的危险信号,而不会选择增加审计投入。

### 3. 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我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兴加转轨时代,市场化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反映了该地区资源配置情况以及公司外部法治水平<sup>[25]</sup>。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一方面市场干预较少,可以降低审计师等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1)	(2)
	<i>Lnfee</i>	<i>Lnarl</i>
<i>Cl</i>	0.022*** (2.89)	-0.007 (-0.88)
<i>Size</i>	0.374*** (48.18)	0.085*** (10.81)
<i>Lev</i>	0.065** (2.35)	-0.020 (-0.71)
<i>Roe</i>	0.034 (0.98)	-0.170*** (-4.83)
<i>Age</i>	-0.016 (-0.67)	-0.009 (-0.37)
<i>Growth</i>	0.002 (0.03)	-0.017*** (-2.82)
<i>Tobin's Q</i>	0.136*** (6.48)	-0.007*** (-3.13)
<i>Big4</i>	0.261*** (8.89)	-0.006 (-0.21)
<i>Share</i>	-0.053 (-1.31)	0.001 (0.02)
<i>Board</i>	0.023 (0.71)	0.006 (0.20)
<i>Indire</i>	0.029 (0.31)	0.111 (1.20)
<i>Mshr</i>	-0.173*** (-3.87)	-0.144*** (-3.18)
<i>Loss</i>	0.010 (0.88)	0.038*** (3.42)
<i>Year</i>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488*** (18.63)	0.443*** (9.00)
N	9653	9653
Adj.R <sup>2</sup>	0.6190	0.0718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t值。下同。

表5 不同产权性质下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以及审计延迟的影响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1) <i>Lnfee</i>	(2) <i>Lnarl</i>	(3) <i>Lnfee</i>	(4) <i>Lnarl</i>
<i>Cl</i>	0.013 (1.43)	-0.006 (-0.63)	0.035*** (2.65)	-0.015 (-1.23)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4.986*** (13.24)	2.898*** (7.33)	7.297*** (15.37)	2.585*** (5.69)
N	3751	3751	5902	5902
Adj.R <sup>2</sup>	0.6190	0.0863	0.4465	0.0572

称,使审计师对风险的甄别更为精确,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高意味着法律环境较为完善,对违规企业的处罚也较为严格,企业会迫于法律处罚经济后果的严重性减少违规行为,因此企业自身风险也会降低,审计风险相应降低,审计工作会相应减少进而降低审计收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作用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比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明显。为了对这一推论进行验证,本文利用王小鲁等的市场化指数<sup>[26]</sup>,按照中位数将公司分为两组,低于中位数为市场化程度低的公司,取值为0,另一组为市场化程度高的公司,取值为1。表7列示了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年报问询函对审计收费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市场化程度低组,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组两者并没有显著关系。这表明年报问询函缓解了审计师信息不对称程度,以便其及时应对公司潜在的风险,对法制环境不健全以及监管不足的情况进行补充,因此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法制环境较差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而不论样本公司所处的法制环境如何,年报问询函都没有造成审计师的审计延迟,这表明审计师对收到问询函的公司会直接收取风险溢价而不会选择提高审计努力程度。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论文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1)本文研究中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从而导致问询函与审计费用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基于此,本文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缓解内生性。本文将收到年报问询函的公司作为处理组,选择公司规模、财务杠杆、公司年龄、公司成长性、事务所类型、股权制衡度、董事会规模、盈亏水平这些影响公司是否收到问询函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近邻匹配法匹配得到对照组,分别为9467和9529个样本观测值,匹配完成后对样本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在控制了收到年报问询函与未收到年报问询函公司的特征差异后,变量*Cl*与*Lnfee*相关系数为0.028,

在5%水平上显著,与*Lnarl*系数不显著,即审计师对于收到问询函的公司通过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补偿来降低审计风险,而不会选择增加审计投入,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2)针对年报问询函的接收范围进行拓展,对于当年或前一年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CL\_K*取值为1,否则为0。实证结果如表9所示,变量*CL\_K*系数为0.040,在1%水平上显著,而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延迟系数不显著,再次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3)在审计定价模型中,利用*Dfee*(当期审计费用与上期审计费用的差额)对审计定价进行重新衡量,实证结果保持不变。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年报问询函对审计定价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定价之间具有正向显著关系,但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延迟没有关系,问询函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来自审计师收取的风险溢价,而非其增加努力程度的结果。进一步分析

表6 不同内部控制治理下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以及审计延迟的影响

	内部控制高组		内部控制低组	
	(1) <i>Lnfee</i>	(2) <i>Lnarl</i>	(3) <i>Lnfee</i>	(4) <i>Lnarl</i>
<i>Cl</i>	0.006 (0.39)	-0.019 (-1.23)	0.025** (2.09)	-0.004 (-0.28)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4.811*** (14.68)	2.453*** (6.85)	6.116*** (23.13)	2.345*** (8.54)
<i>N</i>	4835	4835	4818	4818
<i>Adj.R<sup>2</sup></i>	0.6510	0.0653	0.5293	0.0737

表7 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年报问询函对审计费用以及审计延迟的影响

	市场化程度高组		市场化程度低组	
	(1) <i>Lnfee</i>	(2) <i>Lnarl</i>	(3) <i>Lnfee</i>	(4) <i>Lnarl</i>
<i>Cl</i>	0.020 (1.45)	-0.004 (-0.26)	0.024** (2.21)	-0.011 (-0.90)
<i>Controls</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Year</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5.427*** (20.75)	2.423*** (8.67)	5.383*** (21.20)	2.130*** (7.68)
<i>N</i>	4209	4209	5444	5444
<i>Adj.R<sup>2</sup></i>	0.5463	0.0571	0.6145	0.0697

表明,问询函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且问询函监管对公司内外部治理监管的补充作用不容忽视。同时本文的结果也表明对于收到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上市公司,审计师并没有通过扩大审计范围、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的方式加大审计投入,而是消极地选择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客户身上。因此,相关部门一方面应该完善其监管制度,对审计师的成本效益函数进行修改,另一方面对于审计师为了降低自身损失而“无视”存在问题公司的行为应该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从根本上促使其切实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问询函与审计师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更立足于已有学者研究基础上揭示了问询函对审计师定价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但同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审计定价是由审计成本与风险溢价共同决定的,但是风险溢价不可观测,审计成本大多使用审计延迟变量度量,衡量指标过于单一,因此审计成本与审计师要求的风险溢价补偿的衡量指标有待进一步考证。此外,本文只是在控制其他影响审计费用的相关变量基础上研究“是否收到问询函”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没有对问询函的内容进行详细分类,缺乏对问询函的全面分析,因此审计成本与风险溢价的衡量指标以及不同问询函特征下问询函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表8 PSM回归检验

	(1) <i>Lnfee</i>	(2) <i>Lnarl</i>
<i>Cl</i>	0.028** (2.21)	0.005 (0.73)
<i>Size</i>	0.366*** (80.80)	0.022*** (8.46)
<i>Lev</i>	0.119*** (4.54)	0.008 (0.54)
<i>Age</i>	0.009*** (11.51)	-0.002*** (-4.85)
<i>Growth</i>	-0.001 (-0.38)	-0.002 (-1.04)
<i>Big4</i>	0.695*** (31.05)	-0.070*** (-5.54)
<i>Share</i>	0.307*** (8.41)	-0.037* (-1.75)
<i>Board</i>	-0.084*** (-3.67)	0.012 (0.89)
<i>Loss</i>	0.074*** (4.67)	0.083*** (8.97)
<i>Year</i>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5.669*** (49.63)	4.123*** (62.07)
N	9467	9529

表9 扩展问询函范围检验

	(1) <i>Lnfee</i>	(2) <i>Lnarl</i>
<i>Cl_K</i>	0.040*** (5.64)	-0.002 (-0.26)
<i>Size</i>	0.374*** (48.31)	0.085** (10.61)
<i>Lev</i>	0.060** (2.21)	-0.022 (-0.78)
<i>Roe</i>	0.045 (1.32)	-0.173 (-4.86)
<i>Age</i>	-0.023 (-0.97)	-0.002*** (-4.85)
<i>Growth</i>	0.000 (0.00)	-0.016*** (-2.73)
<i>Tobin's Q</i>	0.013*** (6.52)	-0.006*** (-2.89)
<i>Big4</i>	0.251*** (8.66)	-0.008 (-0.27)
<i>Share</i>	0.175** (2.04)	-0.001 (-0.03)
<i>Board</i>	0.019 (0.59)	0.012 (0.35)
<i>LnDire</i>	0.021 (0.23)	0.120 (1.27)
<i>Mshr</i>	-0.170 (-3.83)	-0.146*** (-3.18)
<i>Loss</i>	0.010 (0.93)	0.037*** (3.30)
<i>Year</i>	控制	控制
<i>Industry</i>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5.553*** (18.75)	2.672*** (8.73)
N	9514	9514
Adj.R <sup>2</sup>	0.5705	0.0720

参考文献:

[1] Brown S, Tian X S, Tucker J.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SEC comment letters on qualitative corporate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the risk factor disclosur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8, 35(2): 622-656.

[2] 陈运森, 邓玮璐, 李哲. 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9(3): 169-185.

[3] Gietzmann M B, Pettinicchio A K. External auditor reassessment of client business risk following the issuance of a comment letter by the SEC[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4, 23(1): 57-85.

[4] Taylor M E, Baker R L. An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audit fee[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2016, 12(4): 55-60.

[5] Taylor S D. Does audit fee homogeneity exist? Premiums and discounts attributable to individual partners[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1, 30(4): 249-272.

[6] 郭葆春. 非审计服务与审计定价: 一个实证研究[C]. 新经济环境下的会计与财务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2002.

[7] Jaggi B, Low P Y. Joint effect of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securities regulations on audit fe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2011, 46(3): 241-270.

[8] 宋衍衡. 审计风险、审计定价与相对谈判能力——以受监管部门处罚或调查的公司为例[J]. 会计研究, 2011(2): 79-84.

[9] 杨玉龙, 张川, 孙淑伟. 政治关联能否屏蔽证券监管对于审计师的治理效力? ——基于民营上市公司证券违规的情景考察[J]. 审计研究, 2014(4): 97-103.

[10] 陈硕, 张然, 陈思. 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影响了审计收费吗? ——基于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经纬, 2018(4): 158-164.

- [11] 米莉,黄婧,何丽娜. 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会影响审计师定价决策吗? ——基于问询函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4):57-65.
- [12] 陈运森,邓祎璐,李哲. 非行政处罚性监管能改进审计质量吗? ——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18(5):82-88.
- [13] 陶雄华,曹松威. 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与审计质量——基于年报问询函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的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2):8-18.
- [14] 冯延超,梁莱歆. 上市公司法律风险、审计收费及非标准审计意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0(3):75-81.
- [15] 宋衍蘅,肖星. 监管风险、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J]. 审计研究, 2012(3):83-89.
- [16] 刘笑霞,李明辉,孙蕾. 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J]. 会计研究, 2017(4):88-96.
- [17] 任莉莉,张瑞君.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审计延迟与审计定价——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2006—2016年数据的分析[J]. 商业研究, 2018(5):124-132.
- [18] Bozanic Z, Dietrich J R, Johnson B A. SEC comment letters and firm disclos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7, 36 ( 5 ) : 337-357.
- [19] Johnston R, Petacchi R. Regulatory oversight of financial reporting: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comment letter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 34(2): 1128-1155.
- [20] 陈运森,邓祎璐,李哲. 非处罚性监管具有信息含量吗? ——基于问询函的证据[J]. 金融研究, 2018(4):155-171.
- [21] 刘柏,卢家锐. 交易所一线监管能甄别资本市场风险吗? ——基于年报问询函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19(7):1-15.
- [22] 张继勋,陈颖,吴璇. 风险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的研究——沪市2003年报的数据[J]. 审计研究, 2005(4):34-38.
- [23] 朱红军,章立军. 审计费用的特征及其分析——来自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证券市场导报, 2003(12):34-39.
- [24] Ashbaugh-Skaife, Collins H D, Kinney W, et al. The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3): 217-250.
- [25] 王亮亮,王跃堂,王娜. 市场化进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公司未来业绩[J]. 经济管理, 2013(9):101-112.
- [26]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责任编辑:高 婷]

## Annual Report Inquiry Letter, Audit Pricing and Audit Delay

SHEN Ping, JING Rui

(School of Accounting,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gulatory transformation of CSRC, non-punitive regulation receives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policy makers and scholars. Among them, the supervision mode with inquiry letter mechanism as the carrier makes the annual report of listed companies “remove makeup”, and the company’s existing problems are exposed to the public, which makes investors applaud. Under the risk-oriented auditing mode, it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discussion whether the auditor regards the inquiry letter as a risk early-warning signal and changes the audit pricing decis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using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5 to 2018,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annual report inquiry letter issued by the exchange on audit pric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nnual report inquiry letter and audit pricing. On this basis, with the help of audit delay, a measure of audit cost, it 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audit pricing is the result of the auditor’s demand for compensation for risk premium, and the auditor has not increased more audit input to the listed companies receiving the inquiry letter. This kind of correla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the companies with lower level of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the companies in the areas with poorer marketization.

**Key Words:** annual report inquiry letter; audit pricing; audit delay; audit risk; audit cost; audit dem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rporate governance